

【史家名著书系】

日本维新史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加拿大] 诺曼·赫伯特(E.H. Norman) 著 / 姚曾虞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史家名著书系】

日本维新史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加拿大] 诺曼·赫伯特(E.H. Norman) 著 / 姚曾虞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李建伟
封面设计: 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维新史 / (加) 诺曼 (Norman, E.H.) 著; 姚曾
虞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4
书名原文: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ISBN 978-7-80720-669-9

I. 日… II. ①诺…②姚… III. 明治维新 (1868)
—历史 IV. K31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677 号

书	名: 日本维新史
著	者: [加] 诺曼
译	者: 姚曾虞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20-669-9
定	价: 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引 言

这是一本资料比较丰富又有一定见解的关于明治维新和维新后几十年间历史的书。

作者 E. H. 诺曼是加拿大人，1909 年生于一个在日本传教的牧师家庭。1933 年他在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英国和欧洲中古社会经济史，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日本和中国问题，1939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于 1939 年入加拿大外交部，从 1940 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加拿大驻日使馆任职，同时研究日本近代史。日本投降后，任加拿大驻日首席代表。1950 年归国，历任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司长、情报司司长等职。1953 年任加拿大驻新西兰高级专员。1956 年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1957 年 4 月坠楼自杀。著述除本书外，还有《日本的兵士与农民——征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 of Conscription*, New York, 1943）、《安藤昌益与日本封建主义之解剖》（*Ando Shoeki and the Anatomy of Japanese Feudal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Third Series, Vol. 2, Tokyo, 1949*）和尚未刊行的《日本政治的封建背景》（*Feud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Politics*）。

本书以夹叙夹议方式论述从明治维新经过制宪法、开国会到日俄战争这三十余年间的历史，从维新背景和过程谈到维新后的工业、农业和政治等方面。作者参考了不少书，并利用了战前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

的资料对于研究明治初期历史颇有裨益。

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和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发展。但他在摆脱偏见、比较认真地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也得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意的结论。明治维新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具有进步意义，关于这一点，作者给予了正确的估计。关于明治维新的领导，作者说，“幕府的推翻是通过以下级武士和浪人，特别是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等西部强藩的下级武士和浪人为领导，伙同少数公卿，在大阪和京都的巨商富贾的财力支援下的反德川势力的结合而获得实现的。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的领导权是握在下级武士的手里的，那些下级武士逐渐取代上级武士和封建领主而成为当代的政治发言人”。这种看法也是恰当的。作者分析明治维新后的农民运动，认为是反封建的、革命的，但也有一两次农民斗争为反动武士所利用，以求达到他们回到武士支配的旧社会去的目的。这样分析应当说是确切的。作者说“自由党所体现的日本自由主义自始就具有温和妥协的性质”，这样论断也符合实际情况。

作者有些论点言之成理，但不够全面，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在论述封建势力和商人联合的历史背景时，作者指出，“最重要的事实却是在纯封建关系的倾毁之中一个新地主阶级的逐渐成长，而那个阶级正日益感到在农业领域内以维持修正的封建关系为有利，因此和封建阶级的大名比和农民更加利害相同”。“从农民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封建当局和新地主阶级这两方面的经济压榨是一并加以反抗的”。封建领主和新地主都属剥削阶级，利害一致，他们都遭到农民的反对，从根本上讲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作者又认为，旧封建统治者和新地主这两个集团“随着德川时代渐近末期而日益靠拢”，则不全符合事实。这样就忽视了两个集团间的矛盾，而到明治维新前夕，这个矛盾恰恰尖锐起来。封建大名领地制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幕府与多数的藩都抑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但新兴地主和商人在维新前夕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抱着支持或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并不与封

建大名集团靠拢。领导维新运动的下级武士意在推翻顽固保守的德川幕府，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他们反对大名领地制，但另一方面他们远非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相反，新政府成立后，皇室和许多皇族、华族都成为新地主，封建关系在农村仍占统治地位。因为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剥削阶级的统治后，总是保存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前一社会阶段的残余，作为辅助剥削和统治的工具，例如世界各国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奴隶制残余留存到已经绝迹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封建制残余。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制度。日本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没有足够力量推翻旧事物——封建生产关系，而封建制度也已没有足够力量否定和抗拒新的生产关系，于是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的妥协，新政府利用农村的封建关系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事实上，日本的原始积累很大部分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税，日本农村长期供应廉价劳动力，成为城市资本主义的附庸。二战后日本反动政府才开始企图迫使大量农民“离农”，推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政策。如果说维新前后日本的新兴地主与资产阶级靠拢，大体符合当时情况，如果说他们与封建大名靠拢，似乎与事实不尽相合。

在论长州藩改革时，作者说：“开明党在长州的胜利乃是同样势力在1867—1868年以及此后数年间在全国舞台上胜利的一个先声。”下面作者又指出：“这些藩政改革非但无补于农民的解放和为制造业建立国内市场，反而通过独占制，通过将贡米折收货币，以及不惜加重农民的困苦而抽征新税的办法来维持高物价。因此，在商业资本势力雄厚、工场生产初奠小规模基础的这些富足的倒幕各藩之内，农民反抗之所以反而最为激烈、最为持久，并不是事出偶然的。”这些看法都有理由。但作者没有指出，藩政改革一方面是明治维新的先声，一方面却和明治维新仍有根本不同之处。明治维新改变封建大名领地制度的基础，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农民比德川幕府统治时获得较多的自由，为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以后政府又用办模范工厂和廉价将它们售给私人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经营。各藩的改革却不如此，并未触动原有的经济基础。工场由藩

政府经营，也并非完全依靠雇佣劳动，萨摩藩营工场的封建性尤其浓厚。如果单说藩政改革是维新先声，便会把两者的性质混同起来。

关于《五条誓文》，作者说“是以众所周知的和可以接受的词句来表达全国人民大众的反封建欲望的一项文书”。这样评述基本正确，但对《五条誓文》制定过程和各条具体意义论述似乎不够。《五条誓文》最初由由利公正起草，第一条是“使庶民遂志，人心不倦”，第五条为“万机决于公论，勿得私论”，暗示着较多的政治上的民主。后经福冈孝弟修改，第一条改为“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实际是主张只征询大名意见，“庶民”被排除在外。最后木户孝允定稿，第一条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含糊其辞，说明当时政府当权者对于仅仅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都不敢许诺给人民。定稿第二条“盛行经纶”意为振兴实业即推行资本主义。第三条“官武一途”指公家与武家合作，“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指废除身份等级制。第四条“打破从来之陋习”指与外国交往。《五条誓文》集中表达了维新政府内政外交的主要纲领，应该予以充分估计。

尽管作者在某些问题上作出正确结论，对另一些问题提出虽不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的看法，然而在唯心史观指导下的作者对一些根本问题却没有触及其实质，于是得出错误的结论。作者论述明治维新背景的第二章中，对于推翻幕府这一斗争中作为基本动力的农民完全忽略。明治维新一章中列了“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一节，但对农民打击幕府政权的作用估计得极低，甚至同意一个日本学者的看法：“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置身于革命之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日本农民虽未能领导这一运动，但长期的反抗斗争，尤其是维新前几十年间各地频繁爆发的农民和市民斗争，震撼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斗争，下级武士和少数贵族根本不可能推翻幕府。和一切唯心主义史学家一样，作者在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时，对于个别上层人物则给予过分夸大的估价。作者在结束“明治维新”一章时说，“偕维新以俱来的那些划时代的变革是由最能

干、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藩阀军事官僚所组成的一个政府来实行……这些军事官僚在日本建设现代国家之际，乃是进步的先锋，现代化的前卫”，这就是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一例。

作者唯心史观的另一表现是强调事物发展的外因而忽视内因。在论述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时，没有从当时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消长等方面考察、研究矛盾如何得到解决，却只强调英国当时忙于侵略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国际环境和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当时腾不出手来破坏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事实，但如果以此为明治维新成功唯一的、主要的原因，岂非本末倒置？

从上述作者略历可以看出，他是参与加拿大政治外交的统治阶级上层分子，因此，帝国主义学者为殖民侵略辩护的倾向在本书里也必不能免。美国打开日本大门后，日本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关税不能自主，大量生丝、蚕卵纸等原料输出，外货倾销打击本国工业产品。西方列强炮舰轰击，并在日本驻兵。英法还参与幕府与西南大名之间的政治斗争。当时日本各阶层有识之士都觉察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这个威胁为推动倒幕运动起了很大作用。这里作者却不再强调外因，反而说日本贫瘠衰弱，西方列强不屑来侵略，“若将西方列强开放日本的努力解释为打算乘人之危来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有计划的企图，则不免过甚其词”。这不是显然在为西方列强特别是为当时的美国狡辩吗？

本书所附参考书目提要和日本名词解释对于中国读者也有用处。但是书目只限于资产阶级学者著作，本书完成时已经问世的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者集体编写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都是研究明治维新极为重要的著作，而未被列入，不能不说是故意的也是严重的遗漏。

周一良

1962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明治维新的背景	9
第一节 封建制度的衰颓	9
第二节 打破海禁	29
第三章 明治维新	42
第一节 封建势力和商人联合的历史背景	43
第二节 藩独占制及其对封建势力与商人关系的影响	48
第三节 资本主义输入各藩	50
第四节 封建势力和商人的联盟与明治维新	52
第五节 在藩政改革运动中现代官僚阶级的诞生——长州藩之例	54
第六节 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1868—1877 年)	60
第七节 作为明治维新领导者的下级武士	68
第八节 因征韩论而引起的分裂	72
第九节 同政府的继续对立终酿成内战	75
第十节 明治政府的反封建政策、对封建诸侯和地主阶级的态度	78
第十一节 结论:制约日本成为现代国家的诸因素	87
第四章 初期的工业化	90

第一节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90
第二节	分工	91
第三节	资本积累	93
第四节	欧洲重商主义和日本重商主义的比较	94
第五节	日本银行资本的优越地位	97
第六节	外国资本在日本初期工业化中所发生的作用	100
第七节	战略性工业的沿革和影响	102
第八节	在军事需要制约下的日本工业化的出发点	109
第九节	工业政策的变更和国营工厂转让的法律规定	111
第十节	关键性工业和官僚阶级	116
第五章	土地改革及其社会后果	119
第一节	土地私有的趋势	119
第二节	1873 年的地税改正	121
第三节	农民的丧失土地	126
第四节	日本农民丧失土地及其影响——日本与英国的对比	131
第五节	日本农业零星经营的原因及结果	135
第六节	日本佃农的社会性质	137
第七节	停滞的过剩人口问题和劳动市场的形成	138
第八节	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其限制	141
第六章	政党和政治	148
第一节	第二期农民运动(1877—1883 年)和自由党的诞生	148
第二节	初期政治团体及政党的概况	154
第三节	政府对待政党的政策	157
第四节	1884 年自由党解散后农民反抗的新转变	160

第五节 国家权力的强化:1889 年的宪法	163
第六节 政党和议会	168
第七节 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171
第八节 为了国家独立,如何不可避免地走上扩张的斗争	173
第九节 自由党反对派的立场和日本政府内部“军政之间”的问题	177
结论	183
明治史参考书目提要	186
西文书目	197
日文书目	206
西文杂志论文	209
中文论文	213
日文杂志论文	214
日文名词及成语注释	215

第一章 绪 论

这本书的目的是打算先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日本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外交政策的明治改革的那些特点并加以分析，然后再探讨其发展过程，自封建制度末期起，寻踪索迹，以迄于 19 世纪末叶国家权力在新制度下奠定时为止。虽然也触及了一些附带的问题，但全书的中心问题却是要阐明明治维新（1868 年）以后一个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的国家的迅速成立，以及在国家扶植与统治的情况下一一种工业经济的发展。

这篇绪论不期而然地一下手就要把得自前一个时代的一些概括结论同现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本篇所打算作的这番努力只能占很少篇幅，所以这就有待于读者去将现代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一番比较，扬弃其不相干的和暂时性的事物，探索明治政府中比较根本和意义深远的特质，从而测定其对于近半个世纪来日本政策实施的影响。希望读者能经常不忘记现在，这样，如果在这本书中能发现什么有兴味或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了。

这篇关于明治时代的历史论文中的一些事物，对于一位研究 1940 年日本的读者，一古一今，似乎是距离太远了。然而明治日本的许多事物都一直流传至今，甚至在现代日本反而昌盛起来：官僚阶级和军人阶层的发达和繁衍；政党和议会的懦弱无能；国家对企业的干涉；小型工业的丛生；西洋技术用来适应日本需要；以人口过剩的农村、小规模农地和缺地少地的农民为特

征的农业上的周而复始的危机；国内市场购买力的薄弱——所有这些都是形成日本生活的一些比较显著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对于明治时代没有一定的认识就不能理解。作为明治时代的背景来看，则此前的德川时代的突出特点便又至关重要了，因此第二章特将 1868 年维新的历史背景作了一番交代。

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举出例子来阐释一个令人感到厌烦的不解自明的道理，即先前的事物通过原因和结果的连锁，必然要塑造和制约后来的事物，因而学者总是追溯既往，以期探本求源。然而我们却不必要全盘接受佛教教义那样，承认人事上和国事上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宿命论。历史发展的洪流所行经的渠道是一半确定了的，但是间接予以左右的人的意志却可以变更它的进程，虽然不能完全阻塞其去路。日本的情形亦复如此。图样但凭明治时代的建筑师们去画，但材料大部分是现成的，这是前代的遗产。

就日本的情形而论，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所产生的问题并没有任何事前注定的解决方案，但是既为德川时代的遗产所制约，它的选择或变更的余地自比某些先进的现代国家要更少一些。然而这种限制本身却可以变成有利的条件，正如明治先驱者们所解释的那样。他们能够以前途的重重危险来警告国人，打消妄想通过任何捷径以实现乌托邦或帝国的一切迷梦。因而政治和外交在他们灵活的手里就变成了一种无限复杂的柔术，一种转弱为强、转复败而为新攻势的技巧。他们认识到，从已经陷国家于衰败之境的封建制度中慢慢解脱出来的一个国家，要想向任何一个称霸世界的强国挑衅，甚至想和摇摇欲坠的清朝冒险一战，都需要在新政权之下花上一段时间和费一番心血来休养生息的。对于日本所受的限制条件的这种认识，具体表现为注意等待列强分别陷入纷乱的时机，在列强联合行动的威胁面前退让，然后乘其最纷乱之际加以打击。这种接连发展的事件是毋庸在这里举出实例读者就会想起的。但是，如果要概述日本外交政策的这种特质，最好还是回忆一下谷（干城）子爵在 1887 年所说的那段给人以极深刻印象的语句：

“修武备以策国家的安全——鼓励和保护国内的人民，然后等待欧洲变乱

的发生，而欧洲变乱事实上是迟早所不免的。其事虽与我国无直接干系，但是如此一桩大事一定会同样震动东方各国，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因此，虽就欧洲而论我国不会卷入其中，然而却可一跃而成为东方的霸主。”^{①②}

在明治年间和明治以后，日本政治家的行动准则可以概述如下：（一）日本始终因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为时过晚和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受到限制；（二）列强间的目的和行动的一致性绝不能维持很久。从这两项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正如谷子爵所说的那样，在列强冲突最尖锐的时候，日本的机会即应运而至。忍耐、准确的判断和随时去作稳而狠打击的决心，始终是日本外交政策的特色。凭借这种方法，它以比较小的力量获得了其他经济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历经长期战争、挫折，甚至失败之后方才得到的成就。日本帝国在前后约三十五年之中建立了起来，其间打过三次胜仗：1894—1895年、1904—1905年和1914—1918年。日本在这几次战争中没有一次过多地消耗国力，在下一步的1931—1938年的大扩张中，以突然的袭击而割裂了中国内地及其“满洲”，更加没有什么消耗。对本身的弱点有自知之明，加之对潜在敌国的力量有精确的估计，这是可以化险为夷的。我们为衡量这个政策的成功，不妨提一下在19世纪之际和20世纪初期，沙俄这个庞大帝国当它的弱小邻邦兼竞争国从一个贫困的封建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一流的海军国和殖民地占有国时所一再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

但是明治改革所留下的最大烙印却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方面。商人和封建因素在维新之际的政治上的妥协，正如本书中所详加说明的那样，曾经使

① 引自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日关系四十年》，纽约和伦敦，1937年版，第13—14页。

② 按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第465页所载谷干城意见书原件，应逐译如下文：“然则今日宜取之政略如何？曰：应废绝从来之主义政略，抛弃依赖他方之虑念，严设兵备，深此沟渠，高此城堡，对外表达信义，正威严而不为玷辱国光之事，内则发挥与民共守之志操，以待欧洲之变乱。欧洲早晚必有干戈破裂、马蹄蹂躏中原之期。虽然我国原不应干预欧洲之变乱，但欧洲之变乱波及之处必甚广，因此必摇动东洋诸国，以致东洋亦发生兵乱。故我国虽对欧洲各国无足轻重，而于东洋诸国之中欲执牛耳，为盟主，则当此之时，使我邦拥坚牢之兵舰二十艘，精锐之陆军十万名，即可争衡于东洋，见重于欧洲。”——译者

以往的封建领袖和封建看法能远比在其他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明治时代甚至在明治以后，企业利益始终不如在法、美之类国家中那样得逞，也不像那样直接担负着政治责任。这种妥协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副产品，是官僚阶级的建立，这个官僚阶级在它的根源上就显出了鲜明的封建色彩。虽然在平时它是政府的奉命唯谨的工具，可是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半独立性，从而产生了一种团结心。

就历史来看，这个官僚阶级部分通过以革新的封建藩阀为一方，以企业利益为另一方所体现的诸种势力的巧妙平衡而开始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它随即把这个地位巩固了下来，接受了兵工、造船之类的军事性的和由国家统治的各种工业的管理权。它的上层人物大部分是从以前的封建贵族阶级中选拔的，他们蔑视从事琐细法律事务的职业政客；它几乎不容许议会之类的下级机关，甚至试图改革或无视它的集体意志的大臣们从旁置喙。例如，1939年秋季在东京发生的外务省官员的罢工，竟致迫使首相和外相采取非常迁就的甚至坦白的态度，这是在他国所罕见的。这桩瞬息即逝但意义深远的事件说明了官僚阶级所具有的内部团结，以及如上文所述它们所享有的半独立地位。

在为内部改造、国家安全和国际承认而斗争的年代里，这个集团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行政器官。至于现在是否如此，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鉴于人们常常隐约说它虽享有一定特权和豁免权而不负相应责任，以“治外法权政府”一词来称呼它，则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对它已抱有一种泛泛的愤懑情绪了。

人们也许会考虑到官僚阶级在防止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完全胜利上的重要性。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时间一天天过去，而极端法西斯主义分子依然像他们在激动争夺政权的前夕一样，远未能完全控制国家的机构和决策——这绝不是要低估他们相当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著者执笔的时候，仿佛他们正在很客气但却不失其为坚决地被逐出政府中的一些枢要地位。若说他们已

经终于甚至断然被打垮，固不免冒昧，但是看上去仿佛日本企业界已经从德国的经验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在德国，纳粹党绝对控制了国家权力和外交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强迫人牺牲的制度，甚至威胁到了某些帮同它取得政权的利益集团和人们的本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位日本的泰森将会放弃他的国家和他的财富；反之，某位日本戈林倒不是不可能从现役名单改编到预备役名单中去的。我们可以放心地说，由于那个到处存在着的匿名集团——官僚阶级往往同宫廷中的上层阶级采取配合行动，所以将极端全体主义陷于孤立地位，已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这个官僚阶级的背后，还有那些更加古老、更加保守的金融巨擘，它们经过一段政治蛰伏期之后，在内外政策的制定上，又大有发挥比较积极作用的趋势了。

在全书之中，着重点始终放在维新的两个方面：第一，从封建日本过渡到现代日本的速度和方式；第二，完成维新大业的领导者们的社会性质。后者诞生于封建贵族的（反德川）一系，并受到大阪和京都的大商人的支持。实行维新所取的这种专制方式使领导者们对于彻底的民主主义得及时以机敏的措施来防患于未然。我们姑且作一个大胆的对比，这犹如法国大革命曾经以吉伦特党和费庸派的胜利，以最初受到米拉波、特别是拉斐叶特之流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贵族连同巴纳夫和罗兰之流有名望的市民支持的一种改良君主政体而告一结束的情形一样。然而这种比较却曲解了历史，因为法国商人靠了他们的独占权，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而拥有的力量，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封建贵族的政治优势上都远胜于 1864 年的日本商人。因此日本资产阶级在政府各部门中所占的地位必然不如激进民主主义时代以前的法国资产阶级。

由于德川封建制度是从上而下破坏的，这就使得遏制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民，通过从下而上的行动去展开反封建运动的任何叛变性的企图有了可能。一旦在维新战争（1867—1868 年）中袭取了德川统治的七零八落的堡垒并在随后数年之中对于封建豁免权和特权加以侧击之后，新政府对于下层

阶级的任何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就像对于各种恢复旧制度的企图一样，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了。这种政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一个备有相当大的警察力量或军事力量可供其随意调度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个需要是具有开明绝对主义特性的明治政府的原动力。那个政府矢志于并且实行了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开始了工业化，并创立了一支现代陆军。这支陆军首先是供防范西方列强侵犯的干城之用，其次则是作为防止恢复旧制度的企图的一道最后防线，但是所特别防范的却是新觉醒的、战斗的自由主义的精神，那种精神在当时大有将初发端的民主主义倾向强行推广并贯彻到底之势。这支初期的陆军、警察队和官僚机构差不多完全是由以前的武士或封建主的家臣构成的，因而（除少数例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抱有敌对的情绪。

虽然明治时代的领导者们在工业技术、银行制度、军事组织和教育制度各方面颇借重于西方，然而它接近于过去的封建制度，尤其是上文已约略提及而本书正文中尚须详加论述的封建阶级与商人阶级的影响深远的妥协，却已经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特别是在精神领域之中。封建的忠义观念、家长制、对妇女的态度、武德的崇尚——所有这一切都在日本取得了一种如热带落日的回光返照。这个比喻是用来说明即使在往往看上去是一个国家的固有的和不可分割的精神或文化色泽的事物上，也有其盈虚消长。在日本，一种新生活方式的采纳和它的文化及心理表现的完全成熟之间，始终是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的。只要这种距离依然存在，我们就会在这个国家看到那种奇妙的景象：大工业中心是煤烟蔽日，而田园和农村却居住着一念及“古代日本的精神”，其忠义之心和激动之情便不禁油然而生的千百万人民。这种精神并不是先天的禀赋，它是成长于数世纪来既已取得的思想训练、传统和习惯的，而这种训练、传统和习惯却是两世纪来远未普及的“现代化”所不能一笔抹杀的。好也罢，坏也罢，随着一个新的日本的工业文明的成长、发芽、枝繁叶茂和根蒂日深，则日本中世纪的那种家长制的而且往往令人其乐陶陶的传统